

南/开/政/治/学/丛/书

霍 特 著

卡斯尔雷的对欧政策

(1812-1822)

KASLER DE POLITIQUE EN EUROPE

卡斯尔雷是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英国历史上最具欧洲色彩的著名政治家，具有同时代英国人所没有的广阔的欧洲观和世界观。1812年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后，他与俄、普、奥三国重建了欧洲均势，建立了欧洲协调，为拿破仑战争后大国合作管理欧洲秩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处理近代国际关系提供了可供探索的新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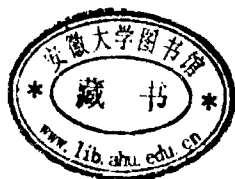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政治学丛书

卡斯尔雷的对欧政策

(1812—1822)

霍 特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斯尔雷的对欧政策:1812~1822 / 霍特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12

(南开政治学丛书)

ISBN 978-7-310-04055-1

I. ①卡… II. ①霍… III. ①卡斯尔雷(1769~1822)
—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56. 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358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3.625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定价:2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摘 要

18、19 世纪之交,作为拥有制海权的岛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是英国历史上最具欧洲色彩的伟大政治家,具有同时代的英国人当中没有的广阔的欧洲观和世界观。卡斯尔雷出生于爱尔兰的贵族家庭,早年在爱尔兰议会供职,曾担任爱尔兰总督的秘书。1798 年,爱尔兰爆发反英起义,他执行英国首相小皮特的命令,将爱尔兰议会并入英国议会,并从此供职于英国政府。1802 年,他担任殖民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07 年改任陆军大臣。1809 年,因与时任外交大臣的坎宁决斗,卡斯尔雷被迫辞职。

1812 年 2 月,卡斯尔雷复出就任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不同于他的同僚和国人是因为他具有良好的意识能力,愿意考虑其他人的观点,愿意使英国的政策适应欧洲的现实和需要。卡斯尔雷不仅显示出良好的意识和克制,而且显然对欧洲感兴趣,愿意倾听他们和与他们工作。1812—1813 年的形势是如此飘忽不定,以至一步的失招就可能使拿破仑挽救他的制度。因此关键是卡斯尔雷的 1814 年 1 月的大陆之行。卡斯尔雷以机智圆通、临事镇静的本领,在弥合分歧方面创造了奇迹。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结果就是卡斯尔雷艰辛和耐心寻求的普遍同盟条约最终实现了”。1814 年 3 月 9 日,四大国签订了《肖蒙条约》,日期倒填为 3 月 1 日。他们很快地认识到它是欧洲新秩序的基

础。“肖蒙是非凡的英国成就,为胜利和平和战后安全奠定了基础。”^①

肖蒙会议后,形势如卡斯尔雷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波旁王朝得以复辟,并签订了温和的第一次巴黎和约。在伦敦会议上,卡斯尔雷又悄悄地以对英国和欧洲有利的方式解决了许多难题。在维也纳会议上,卡斯尔雷直接违背了训令,积极投身于重建欧洲均势的谈判中。在关键时刻的果敢表明了一位政治家的负责任的观念:机会一旦失去就无法挽回。重建了欧洲均势。“胜利的前提是全力以赴,而稳定的前提是自我约束。”^②百日事变后,他成为克制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阻止了“绝对安全”的诱惑。再次与法国缔结了温和的和约,保持了四国同盟,建立了欧洲协调,为战后大国合作管理欧洲秩序奠定了基础。

在1818年的亚琛会议上,卡斯尔雷说服了不愿把英国卷入会议制度中去的自己的同胞,挫败了沙皇建立团结同盟的方案。会议找到了解决欧洲政治紧迫问题的方法。撤出了占领军,法国履行了条约并加入大国协调。亚琛会议证明了会议外交的有效性,消除了彼此间的误解,再次展现了良好的愿望不言自明的益处。卡斯尔雷充满信心地表示:“我真的觉得,这是欧洲政治中的一种新发现,一下子消除了外交方面模糊人们眼界的那些陈腐的污垢……使各大国的协商富有成效,几乎像处理一个国家的事务那样单纯。”^③1820年的西班牙革命爆发时,他联合其他大国,抵制了沙皇对同盟的解释,促使他们放弃了干涉计划。

然而,意大利革命使俄奥走到一起,结果造成了干涉。卡斯尔雷强烈抨击这种政策。是他第一个明确表示英国反对将同盟用于这种目的的立场。希腊革命的发生使英奥恢复了合作,联合制止沙皇干涉希腊的企图。虽然希腊人的遭遇令人同情,但帮助他们会导致欧洲的混乱。沙皇最终退缩了,和平得以拯救。

当卡斯尔雷准备参加维罗纳会议时,他已经有了解决西班牙、

① Paul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501.

②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Gloucester, Mass., 1973, p. 138.

③ H. G. Schenk, *The Aftermath of The Napoleonic Wars: the Concert of Europe — an Experiment*, London, Kegan Paul, 1974, p. 126.

南美革命和希腊的综合方案。然而长期的过度紧张工作使他心力憔悴,导致精神错乱而自杀。由于其政敌和自由主义作家的长期诋毁,卡斯尔雷蒙受了不白之冤。他的政策非常高明,但超出本国人民的经验太远,不能得到举国拥护。因此,政治家必须是教育家;他必须填补本国人民的经验和自己的预见之间、本国的传统和其未来之间的鸿沟。卡斯尔雷的性格不能博取公众对他政策的支持。虽然他创立的“会议制度”归于失败,但这种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协商精神为处理近代国际关系提出了可供探索的新思路。

关键词 卡斯尔雷 欧洲均势 四国同盟 会议制度 欧洲协调

目 录

导论	(1)
0.1 论文题目及其界定	(1)
0.2 论文的基本研究方法	(3)
0.3 关于卡斯尔雷与其对欧政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5)
0.4 论文的准备、已取得的初步进展与可能的贡献	(11)
第1章 近代英国国家外交传统的形成	(13)
1.1 路易十四称霸图谋的失败与 英国世界性权势的兴起	(13)
1.2 英国海外权势的第一轮巅峰	(21)
1.3 美国独立与英国世界优势的严重危机	(29)
第2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外交： 卡斯尔雷的特殊贡献	(34)
2.1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大陆政策的转变： 中立到干涉(1789—1793年初)	(34)
2.2 英国与反法同盟(1793—1812)	(54)
2.3 卡斯尔雷与英国外交的转变(1812—1814)	(73)
第3章 维也纳体系的构建：超越均势	(100)
3.1 第一次巴黎和约与伦敦会议——西欧的重建	(100)
3.2 维也纳会议——中东欧的重建	(113)
3.3 第二次巴黎条约与战后国际机制的建立	(134)
第4章 欧洲协调的运行——从顺利到阻力	(153)
4.1 亚琛会议	(153)

4.2 第一波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运动与 特洛波—莱巴赫会议	(165)
第5章 东方问题	(180)
5.1 希腊起义	(180)
5.2 近东危机的升级与卡斯尔雷的东方政策	(184)
5.3 卡斯尔雷的逝世及其后果	(195)
结语	(198)
参考文献	(202)

导 论

0.1 论文题目及其界定

卡斯尔雷是 19 世纪英国杰出的外交家和卓越的国务活动家,是 19 世纪初期英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与他的前辈相比,他是那样的卓异不凡。1812—1822 年,卡斯尔雷在托利党政府任外交大臣,并任下院领袖,在政府和议会中起主要作用。在反对拿破仑的侵略战争中积极组织反法同盟,协调盟国间的关系,为最终战胜拿破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维也纳会议上,在缔造维也纳体系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维护该体系,他首创“欧洲协调”机制,维护了欧洲各国间的合作,维持了欧洲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他是“欧洲列强共同行动”的组织者,倡导多边主义,建立国际联盟的先驱。这是国际关系史上国际和平与合作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然而,由于他的做法与英国的外交传统相悖,也无法得到国内政府与议会的有效支持,最终无法贯彻和实施自己的对外政策,导致精神极度紧张而自杀。卡斯尔雷的十年的对欧政策既取得了成绩也遭受了失败,毁誉参半。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卡斯尔雷的对欧政策,包括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兼顾 1815 年前与后的异同,但着重于他 1815 年后的对欧政策。

选题原因与价值:

本人与导师商讨关于研究方向与论文写作的问题。作为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外交一直是我个人的兴趣之所在。而外交与战争一样,也是构成传统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内容。导师一直致力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在这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和修养。所以,就决定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选择研究课题。

外交和国际政治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甚至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外交”广义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对外政策及其实施,狭义指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国际政治指的是国际行为主体围绕权力和利益实施外向决策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国际”政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一国政府的行为。一国政府针对国际政治的现状和趋势所作出的回应就是“外交”了。对外交政策的研究属于特殊性的研究,它具有针对性强的特点,因而也就更多着重实用性价值;而国际政治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特点,其价值在于其基础性和根本性。当然其各自的优点正是另一方缺点的所在。令人欣喜的是,存在某些选题处于两种类型的交叉之中,既具有特殊性,能提供某种具体而实用的信息,又能提供基础性、普遍性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19世纪,英国杰出的外交家卡斯尔雷的对欧政策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双重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方面,外交是塑造和维持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最有力的武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愿意在其他国家中间处于不利的地位,不愿意别的国家靠牺牲它来壮大自己,它就不能没有精心布置和组织良好的外交事务,历史这样教导我们,而现代国际局势也证明了这一点。作为国家对外工具的外交的作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之大的。外交活动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命运,若能巧妙地利用这一强有力的工具,就会取得巨大的效果。许多国际间的灾祸,都和原因不同的拙劣外交有关。而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无法离开外交官的。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批能忠诚和熟练地维护本国利益,能帮助本国政府及时弄清有关国家国内发生的变化,能正确地执行本国的对外政策的富有经验和教养的外交官。毫无疑问,英国的近代外交史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同拿破仑的斗争中,英国主要是依靠它的外交和财政资源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英国只是在个别时期才

使用自己的武力,而在其余全部的时间内,它都运用外交手腕来唆使一个个大陆国家去反对拿破仑。在战后的安排中,英国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一切都离不开 1812 年出任外交大臣的卡斯尔雷,他巧妙地运用外交技巧设法将脆弱的反法联盟一直维系到取得反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并成功地在维也纳会议上达成一项既能符合英国利益和要求,又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确保欧洲的均势与稳定的解决办法。为此,丘吉尔盛赞卡斯尔雷,称他那“对大陆事务所表现出来的不温不火的、松弛而平衡的姿态,将成为尔后近一个世纪内的英国外交政策的最好不过的特色”。

另一方面,国际政治是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依据。战争与和平的交替转折,一种新格局的形成,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等等,都会迫使一个国家改变其外交政策的思路。外部压力可以促进国内的团结,由于需要一致对外而取强硬立场;也可因外部压力太大而内部的“抗压力”不足相抵而取妥协姿态,或者对外政策上作相应的若干调整,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同法国签订的亚眠和约即属此;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格局被打破,外交政策随之作相应的调整。拿破仑战争彻底地打破了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导致了国际格局的大变化。当时欧洲各大国都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的思路寻求能够“与时俱进”的外交策略,而在这方面,英国的外交政策无疑是杰出的代表。当前人类正处于世界格局大转换的前所未有的时期。由于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结束,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演变,国际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格局转换的过渡时期,研究卡斯尔雷的对欧政策及其对国际合作体制所作出的贡献,有助于国家主动把握历史转折,及时调整对外政策战略,适时捕捉有利的历史机遇,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0.2 论文的基本研究方法

姑且不论地理因素是否决定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在解释一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时,地缘政治的作用毋庸置疑。一国可以更换其领导

人或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但无法改变自己的地理位置。经典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汉斯·摩根索不仅强调地理是国军强权所依据的最稳定的因素,且指出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不管它对政治决策的意义在今天怎样不同于别的历史时期。^①此外,地缘政治还以权势(特别是权势的军事方面)为基本概念、以安全或同安全有关的权势扩张为基本价值取向,把国家行为置于全球框架之中进行总体把握。所以,地缘政治理论是用以阐释英国外交传统及卡斯尔雷对欧政策连贯性的基本方法。

同样的,以权势为中心的均势论也是论文的基本研究方法。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国要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求得生存、自主和安全,一项基本的战略就是缔造均势,以遏制任何一个有实力且有野心主宰国际体系的大国的谋霸努力。就论文而言,均势理论不仅揭示了英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且最本质地揭示了英国和卡斯尔雷在海外超越均势、在欧洲大陆塑造均势的内在机理^②,从而合理地解释了英国既谋求霸权又反对霸权这两者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的内在一性。

国际机制^③理论是阐释欧洲协调的基本理论依据。欧洲协调被视为“安全机制的最好例子”。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它与英国外交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英国在和平时期对欧洲大陆不承担义务,除非遇到重大紧急情势,那它就要公开干涉欧洲事务,同时尽可能不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保持“均势”。卡斯尔雷认为,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惟有靠国际社会所有主要成员,尤其是国内主导人物积极参与,始能获得保障。对它而言,安全必然是集体的。不论英国对个别问题持何种观点,维持整体和平即维持整体均势理应符合英国整体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51页。

② 有关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的论述,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47—169页。

③ “国际机制”英文为 International Regimes,国内学者也有把它译为“国际制度”、“国际体制”的,但据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考证,应该译为“国际体制”最为合适。参见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6期。本文沿用研究中的一般译法“国际机制”。

利益。他首创“欧洲协调”机制,在和平时期保持一个大国同盟,并且时常集会协商国际事务,以预防和阻止侵略的发生。鉴于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特点,本书拟采用史学、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传统方法来展开研究,在可能之处将历史考察与国际政治理论性思考相结合。具体而言,首先是通过原始资料(指外交档案、文件集、日记、通信录等)进行考证。对原始资料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因为那些编辑和写出来的东西部分的是为了给别人、包括后人看的,因而都有愿让人知道但其实并不完全真实的东西。所以要对这些原始资料进行鉴定,作严格的分析批判,对具体的历史史实,尽可能求得准确无误。其次,对有关卡斯尔雷外交政策的专著和论文认真阅读,仔细比较。不同的作者对同一事件和同一人物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反。这就需要笔者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得出尽量符合事实的结论。再次,要把卡斯尔雷的对欧政策放到工业革命的发展、自由主义的勃兴、旧的国际体系瓦解和新的国际体系的创建的大背景中去考虑,体现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卡斯尔雷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得失,使后人得到更好的借鉴。

0.3 关于卡斯尔雷与其对欧政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自卡斯尔雷辞世以来,一百多年来,西方世界对卡斯尔雷其人和他的外交政策的解读、研究与接受,也经历了反复的波动。由于卡斯尔雷本质上比较保守,漠视公众舆论,而且他的名字是与欧洲复辟时代、欧洲反动分子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但辉格党和自由主义作家对他公开攻击,甚至一些保守人士对他也评价甚低。当时唯一的例外就是19世纪后期的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1862年他发表文章,其中不乏对卡斯尔雷的批评,但同时对他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即使如此,他仍得出结论,认为卡斯尔雷的影响随着他的去世而终结,没有在外交事务上的追随者。另一方面,他相信卡斯尔雷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中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他的政策应为人们所尊重。

直到 20 世纪初期,这一状况才得到根本的改变。而在这一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是 C. K. Webster 教授,他是 20 世纪初期英国著名的对外关系史方面的学者,长期致力于卡斯尔雷任外交大臣时列强对外政策史的研究。他熟悉关于卡斯尔雷的大量史料,除外交档案外,他作为历史学家还第一个接触了温泽和伦敦德里的档案,此外他还研究过巴黎、维也纳、汉诺威和圣彼得堡的有关文献,单以资料而论他的著作极有价值。早在 1912 年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极其缜密地证明了卡斯尔雷在掌握英国对于西班牙及其反叛的美洲帝国的政策时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1913 年他向皇家历史学会宣读了一篇论文,以更大的胆识称赞卡斯尔雷在促成维也纳会议解决波兰萨克森问题上表现出的勇气和治国之才。此时,Webster 已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随着一战的爆发,他的工作也一度中断。1918 年 5 月,他奉外交部之命为预期中的和会准备背景材料。他的工作是编写一本有关维也纳会议的概述。关于这次会议,正如他自己所说,还不曾有过一本精辟的有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用 11 个星期的时间写出了这本优秀的著作,以后一直是论述这个题目的权威著作。《维也纳会议 1814—1815》是简洁的典范,文中列有年表,对会议背景及其机构、工作、结果进行了精湛的考察,还提供了—一个到 1815 年底为止的外交发展的梗概及一个附录。该书之凝练,令人敬佩,清新朴实而不沉闷单调。书中大部分资料来自 Webster 在战前的文献调查,见解无疑是他个人独有的。有两点特别突出:卡斯尔雷几乎在每个争端中居有主导性的重要地位,以及体面地阐述了 1814—1815 年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作者似乎给了这位英国外交大臣以过多的荣誉,那么他后来的著作将使持怀疑态度的人相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然而 Webster 丝毫没有顾此失彼,他直接写到卡斯尔雷最初在波兰萨克森问题上的失败、对来自内阁的不容更改的命令的不予服从,以及—在处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问题时踌躇不决。当 1919 年条约的失败开始为人们所认识时,这位历史学家对 1815 年条约所作的含蓄的辩护显得更加适合。Webster 虽然简单复述了一下对早期那个解决方法带有某些责难,但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主动精神,很少能被在其中生活的活动家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还推测:“如果有人企图用当时人民和政治家均理解的十分片面的民族和民主的模糊

原则来代替那些使欧洲团结起来反对拿破仑的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协定,结果必然会是灾难性的。” Webster 在复员时已完全确立外交史家的地位。战后,他应剑桥某一团体之请,选编了一部关于 1813—1815 年英国政策的文件集(British Diplomacy 1813—1815)。关于这个时期,过去从拿破仑方面研究相当充分,而从盟国方面探讨相对较少。在查阅了外交部的五万多份文件以及已发表的卡斯尔雷与威灵顿的文书之后,Webster 出版了这部有用的文件集。导言篇幅不长,却又给了他一次机会来强调卡斯尔雷外交的崇高性质,实际上即卡斯尔雷政治家才能的崇高性质。与此同时,Webster 还参编了由 G. P. Gooch 和 A. W. Ward 主编的三卷本的《剑桥英国对外政策史 1783—1919》。这是一部大型概括性著作,作者们选择地吸收了从 18 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对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阅读了大量的蓝皮书,外交家们的私人档案,1870 年以前外交部的一些档案,乃至一些外国史料。著作前言明确宣布是根据官方的观点阐述的对外政策问题。由于此书资料丰富,内容广泛,长期以来被推崇为对外政策方面的权威性著作,并列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Webster 为该书撰写了有关 1813—1815 年欧洲媾和的部分。在那里,Webster 再次证明卡斯尔雷在指导反对拿破仑的决定性努力中的伟大之处,尽管作者承认这位固执的托利党人最不善适应战争中获得解放的新的力量,也承认他的主要错误不是在忽视了不准备给以承认的民族原则,而是在对流行起来的制度缺乏信任。1924 年 7 月 Webster 完成了关于卡斯尔雷对外政策研究的第一卷。他选择 1815—1822 年主人公当外交大臣的第二阶段生涯开始叙述,这反映了他在国际联盟头几年对国际体系的高度关注。这本书是根据欧洲主要国家首都档案馆的三四十万份信件、公文和备忘录写成的。作者并没有想写成一部传记,因为卡斯尔雷作为个人,无论是对同时代人还是对历史学家都是难以琢磨和理解的。确切地说,作者研究的是卡斯尔雷的对外政策,并坦率地声明他的观点是英国观点。这本书是以年代先后为序、按专题为基础编撰的,对于背景和人物预先作了细致分析,另外还有一个附录,其体例与 Webster 后来的著作一样。Webster 的主题远不止是确认了一位英国已谢世一个世纪的伟大政治家的地位。他还力求说明,最早的一种国际体系,如何使列强保持了若干年的和睦,

卡斯尔雷开创了会议外交的思想,并且使这种方法在一个时期起了作用。如果他没有死,那么一旦他遭迫害,也许还会得以恢复。这种体系是卡斯尔雷的同胞所不理解,即使理解也未必会赞成的体系。在论述这个主题时,Webster 强调在推翻拿破仑的过程中那些曾经同甘共苦、甚至长期在一起吃住的政治家们特殊的亲密关系。到 1815 年,卡斯尔雷已在那些君主和大臣中获得一种优势地位。在维也纳会议上,正是他“在引导,而梅特涅在跟随”。卡斯尔雷对欧洲事务的控制 在 1818 年达到了顶点。在那里,卡斯尔雷说服了不愿意英国卷进大国重新结盟的长久体系中去的自己的同胞,挫败了沙皇的计划。在 1819—1820 年德意志人骚动时期,卡斯尔雷不动声色而又卓有成效地支持了奥地利,从而使俄国不敢轻举妄动。1820 年伊比利亚半岛发生革命时,卡斯尔雷又成功地抵制了沙皇的干涉计划。虽然他还为国内国王与王后之间的困难问题而伤透了脑筋,但如往常一样,他的稳健外交仍达到了目的。然而卡斯尔雷在 1821 年遭到了一次惨重的失败。Webster 认为,国际体系由一些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的诱惑而被瓦解,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卡斯尔雷强烈抨击这种干涉政策,是卡斯尔雷而不是坎宁第一个明确表示英国反对将神圣同盟用于这种目的的立场。还有卡斯尔雷虽然有时对威尔伯福斯和圣徒们取缔奴隶贸易变得不耐烦,但他在这项事业中的工作是认真的,切合实际的,并且是成功的。在该书的结尾,Webster 认为卡斯尔雷已经有一个解决西班牙、希腊和拉美问题的综合性方案。然后作者叙说了卡斯尔雷精神崩溃以及自杀的悲惨故事。他坚持认为,是过度紧张的工作使卡斯尔雷心力憔悴,并无其他原因。结束叙述时,作者回顾了其主人公的声望由默默无闻到崭露头角的过程,认为这种状况完全是由于他的继任者坎宁以及辉格党和自由主义作家的诋毁造成的。这时 Webster 在全面记录下卡斯尔雷的功绩之后,概述了一下反对他的情况。然而,即使他设想的国际合作体系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但“他为自己确立的目标是这样的崇高伟大,他在克服遇到的重重困难中作出的努力是这样的英勇顽强,以至不能不对他富有胆略的政治家才能肃然起敬”。尽管卡斯尔雷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作为一个个人我们对他无从了解,但就其工作而言,卡斯尔雷“不仅值得他的同胞而且值得人类向他致以谢意”。1924—1931 年期间,

他还觅出时间完成了一部卡斯尔雷 1812—1815 年掌管英国外交的历史。他在一战前已收集了大部分材料,但由于战后外交档案的开放,他必须访问得累斯顿和慕尼黑,并再次查阅巴黎、维也纳和柏林的档案。而且他还可以利用伦敦德里的档案了。该书于 1931 年 1 月完成,该书与前一卷一样极为出色,他完全是根据文件紧扣按年代划分的主题编纂而成。作者考察了 1812—1813 年的形势,当时的情况是如此飘忽不定,以至一步失招就可能使拿破仑得以挽救他的制度,甚至在莱比锡大战之后,拿破仑仍有可能瓦解盟国。值此关键时刻,卡斯尔雷亲赴大陆,最终签订了肖蒙条约,加强了盟国的团结,确保了战争的终结,并为大国在即将来临的岁月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Webster 对维也纳会议的论述和以前的相同但更加详尽,根据也更为充分。Webster 再次强调卡斯尔雷的勇敢和机敏,当在波兰萨克森问题的危机中取得惊人胜利后,一切都遵从他的意见。他确保了四国同盟,这样大国之间依然相互制约,并且有义务继续保持会议外交的体系。该书结尾对卡斯尔雷和维也纳解决办法作了非常精辟的评价。Webster 在权衡褒贬之后用这样的论断结束全书:“对于英国那个不共戴天的被推翻,对于以确保英国享有最持久和平的方式来缔造一个新欧洲,卡斯尔雷做出的贡献比他那个时代任何别的政治家都要多。这些成就足以使他永远置身于他的国家最伟大的外交大臣之列。”该书同上一本书一样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与 Webster 同时期的 W. Alison Phillips 在 1914 年出版了《The Confederation of Europe》一书。该书试图推翻由于前几代人的偏见和无知而加之于卡斯尔雷身上的肤浅判断,恢复他在英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这是第一次在一本书中包含了对卡斯尔雷的好评。一战后,他又参编了《剑桥英国对外政策史 1783—1919》有关 1816—1822 年欧洲会议时期的大国外交的章节。该书引用了大量外交档案,进一步阐述了卡斯尔雷为维护欧洲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R. W. Seton-Watson 是当时与 Webster 齐名的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家,是伦敦斯拉夫学派的成员之一,长期致力于研究 19 世纪欧洲列强的外交。1931 年出版了他的名著《Britain in Europe》。作者花费了 30 年时间,收集和阅读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文件、备忘录和通信录等,依据大量的原始